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
有了思想者 才有理想国

政府片论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英] 杰里米·边沁 / 著
马 兰 / 译

台海出版社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
有了思想者 才有理想国

政府片论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英] 杰里米·边沁 / 著
马 兰 /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府片论 / (英) 杰里米·边沁著; 马兰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68-1105-4

I. ①政… II. ①杰… ②马… III. ①政治哲学—英国—近代②政治思想史—英国—近代 IV. ①D09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9943号

政府片论

著 者: [英] 杰里米·边沁 著 马 兰 译

责任编辑: 戴 晨

版式设计: 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35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105-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编者导言 / 001

序 言 / 098

作者导言 / 122

第一章 政府的形成 / 125

第二章 政府的形式 / 148

第三章 英国的宪法 / 162

第四章 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利 / 177

第五章 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责任 / 201

编者导言

一、边沁的生平

1748年2月15日，杰里米·边沁出生在伦敦亨兹迪奇区的红狮街。据说他生在一个标准的保守党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律师，母亲婚前的名字叫艾丽西亚·格罗夫，是安多弗地区一个零售商的女儿。杰里米年幼时身体羸弱而矮小，性格安静而好学。他三岁多就开始学习拉丁文，对一切可以抱在手上的书籍都孜孜不倦。这些书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七岁时看到的一本费奈隆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后来他曾说过：“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我把自己当成了书中的男主人公。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代表了完美品质的人物。”后

来他又补充道：“这本历险记塑造了我的性格，也开启了我一生的事业。我认为，正是这本书让功利的原理在我心里发了芽。”

边沁的少年老成从这份回忆中就能体现出来，对他来说，这是天生的秉性。他缺乏强健的体格和充沛的精力，而他所缺乏的这些恰好是让一个孩子欢度童年的因素。他一直被一些小病和精神过敏折磨和困扰着，但他并非不幸福，因为他的父母总是那么慈祥地呵护着他。他的父亲并不钟爱文学，对自己孩子的性格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但他却学习了希腊文，以便亲自担任儿子的老师。边沁也喜欢刻意地找些小说和诗集来读，这样的书籍很少见，因此他更加喜欢。“当我得到一本小说，我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我对他们的事情思考得比我对自己的还多。我曾为理查德森笔下的克拉丽莎哭泣了好几个小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吉尔·布拉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为书中每一个人的幸福而感到快乐，为他们的不安而感到烦恼。在我心里，《格列佛游记》占据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我甚至想要证明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完全真实的，既不是历险的小说，也不是大言不惭的吹牛故事，而是完完全全的纪实。格列佛为了拯救小人国的国都而被宣判死刑那一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非常担心他，尤其是当看到他被那些小人绑起来时。当我看到拉普达^①人的境遇，我心里也会非常难过。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同胞被描写成耶胡^②。”许多小孩

① 出现在《格列佛游记》中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② 《格列佛游记》中的一个角色，具有类似人类的外表，但面目可憎，行为

子也有这种类似的感受，但没有哪个孩子会像小边沁那样，因为莫里哀和约翰逊没有提供事实而怀有满腹的怨言。成年人往往认为自己成年后的性格形成于童年时期，这些童年印象会持续地影响边沁成年后的生活，这种影响既深刻，又不经意；使他饱含人道主义的感情，却也因为缺乏想象力而不能欣赏艺术或了解历史。

当边沁到了7岁时，他被送入了威斯敏斯特学校，在那里他待了五年。这里的生活非常平淡，他从未被老师用鞭子惩罚过，只有一次，他因为朋友们的事差点和另一个同学打起来。对于他这种病态的孩子，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烦恼或错误都能造成痛苦。他不喜欢孩子们的游戏，他的身体羸弱到连板球都不能打，不过他参加了一个板球俱乐部，后来的希腊史学家米特福德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边沁发现老师中没有谁能理解他的爱好，也没有谁试图挖掘他的才华。在后来的生活中，每当他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都会觉得那几乎等于在浪费光阴。不过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写得非常好，同学们常常让他代做这类作业。在10岁时，他就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给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副院长博士写了一封信；12岁时，他就被认为可以进入大学了。1760年6月28日，他正式在牛津女王学院入学。

如果边沁在中学时期过得并不愉快，那他的大学时光也是如此。刚被录取，烦恼就开始了，因为他必须为三十九条信纲^①签名，他为此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尚未确认信纲的句句

举止暴露了最原始的欲望。——译者注

① 三十九条信纲是新教安立甘宗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译者注

都是真理，因此他不能诚实地签名。后来他还是签了，只不过心里满怀着一种早熟的义愤。在他多年以后所写的书中，当提到这件事时他仍旧感到非常愤恨，他认为这是把伪君子的歪风强加给他，或者至少是对真理的极不负责。

入学时遭遇的烦恼还算可以应付，不过，由于生活费很少，边沁不得不靠借债度过拮据的日子。更糟糕的是，他的个子仍然矮小，当他套上了成人的短裤和镶了边的衣服，看上去显得怪怪的。在大学里的前辈和晚辈中，他也没有遇到几个能得到他的欣赏或是敬佩的人。边沁厌恶他的导师，一个姓杰斐逊的男子。“他对学生唯一会关注的，便是不让他们享受任何娱乐。”这个导师曾叫边沁重读一遍塔利的《演讲集》，但其实边沁已经能背了。杰斐逊以教授地理为专职。“这是一段他的课堂内容：‘君士坦丁堡在哪儿？’然后他就用教棍在地图上指出了君士坦丁堡。”在桑德森和瓦茨的引导下，杰斐逊得以在逻辑概论方面进行教学。边沁承认自己从桑德森的书中学到了好东西，但同时他也认为瓦茨的书充斥着“老太太的逻辑”。杰斐逊从不花力气去了解学生知道了些什么，也不管学生取得了多少进步，于是，边沁在没有得到他应允，甚至是没告诉他的情况下去修了数学。虽然杰斐逊的坏脾气只是他自己的特性，但他的冷漠却是导师们的共性。他们几乎都是“早上做一些无聊的日常事务，到了晚上就打牌来消磨时光”。边沁对大学里的前辈们下了一个普遍的结论：有些人放荡享乐，有些人抑郁乖戾，绝大多数人死气沉沉。

在与大学同学的交往过程中，边沁丝毫没有多得到幸运

女神的眷顾。许多人都是放荡不羁、酒不释手的。边沁曾告诉过我们，有一个名叫克罗普的同学曾因其行为的恶劣而被杰斐逊先生训斥，杰斐逊先生告诉那个同学：“你会把你头发花白的老父亲给活活气死。”而那个少年却答道：“不，我不会，我父亲戴的是假发。”有一次，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牛津大学自费生请边沁吃晚饭，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他却在边沁回家的途中拦住了他，然后揍了他一顿，在他的眼睛上方留下了一道大伤口。另外，还有一个大学生经常抓着边沁的脚，把他倒提起来，让他脑袋向下。还有一个稍微温和点的同学，坚持每天早晨给他梳头发。在听了那件关于自费生的事情后，再听到刚才所说的那些事，也许读者就不会感到震惊了。后来，他在女王学院遇到了米特福德，但他觉得米特福德只是个平凡的庸才。在这段时间里，使他感到敬仰的几乎只有一个人，那便是达林先生——一位住在安多弗的牧师。在牛津读大学的光华中，边沁的生活充满了苦恼且停滞不前，他既藐视那些课程，又不喜欢他周围的人。后来，当他回忆起这段时光，他没有像吉本那样轻松、礼貌地抱怨一下，而是心情阴郁地表示了愤慨：“虚假和虚伪——我认为它们是英国大学教育必然的产物，也是唯一的一个必然产物。”恐怕在牛津大学里成长起来的名人中，没有谁比边沁更加发自内心地讨厌牛津了。这一时期的生活使他性格中的怪癖牢牢地扎下了根，也使他从学校里得到的教训更为深刻——对旧制度投以漠视和轻蔑，对可能的改革抱以自信的希望。一方面，这些感情与生俱来；另一方面，边沁受到的教育使这些感情得到了加深，终于，他的所

有思想和著作都覆上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1763年，边沁进入了林肯法学院，成为高等法院法庭中的一名实习生。当时这个法庭的审判长是曼斯菲尔德。后来，边沁指责曼斯菲尔德是“极端的保守党分子”，不过在几年前，边沁一直把他视为自己“崇拜的神”。同年边沁又回到了牛津，听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讲座。边沁告诉我们，其实在当时他就已经发现了布莱克斯通的几个谬论之处了。1766年，边沁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大学生活算是画上了句号。那时他仅有18岁，几乎和现在大学一年级学生差不多大。他住在城里，经常去法庭旁听，但是他既不追求飞黄腾达，也缺乏强势的气场去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他的第一桩案件（也是他所接手的唯一一个案件）是一个关于产权纠纷的小案件。他成功地劝服了他的委托人与对方达成和解，因而也失去了这笔诉讼费。虽然他对法律的应用并不上心，但他在理论方面却钻研得非常用功。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英国法律中的缺陷，于是他开始思索，能不能找到一个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每一条法律的价值呢？在读休谟的《论文集》时，他突然想到了这个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原理。休谟说：“道德行为的特质是它产生幸福的倾向；但是，人类作为社会型动物，会从别人的幸福获取快乐，所以，他们不仅应当把自己的快乐作为行为的最终目的，也应当把他人的快乐作为行为的最终目的。”这种理论后来被边沁发展成了功利主义的道德体系。然而，在边沁刚发现这个标准时，这种体系在他心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形态。

边沁发表的头几部作品里，所谈论的事情中并没有讲到很重要的东西。23岁时，他给《伦敦官报》（*Gazetteer*）写了两封信，目的在于替当时遭到几个愚蠢文人抨击的曼斯菲尔德作辩护。几年后，在1776年，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篇名为“法学批判原理”的论文，也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以“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的书名问世的那篇论文。在同一年，他又匿名发表了《政府片论》——一本针对威廉·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的导言部分中的某些观点而作的书。

虽然这本书没有公布作者的名字，其中的一些批判内容也写得冗长、琐碎，但这部评论之书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断言这本书一定是名家之作，比如是曼斯菲尔德勋爵、卡姆登勋爵，或是邓宁（也就是后来的阿什伯尔顿勋爵）写的。据边沁自己说，曼斯菲尔德之所以会赞扬这本书，是因为他不喜欢布莱克斯通。这本书还吸引了谢尔本勋爵——一位很有造诣的政治家，并促使他亲自登门造访边沁。而他们之间那亲密的朋友关系，正是始于这次见面。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谢尔本去世。边沁常去谢尔本位于湖区边的鲍伍德府邸那儿住上几天。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能干的男人和可爱的女人。在很久以后，他曾写道：“虽然我投身到为人类奉献的事业并没有在这里就得以完全实现，但谢尔本的心灵和那栋房子里的温暖友谊，却给我的这项事业带来了第一次进步。”谢尔本对边沁的敬意，对于边沁这种羞涩又带点神经质、不懂与世人打交道的年轻人来说，有如一口提供了希望和信心的泉眼。所以说，

与谢尔本的结交是边沁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边沁开始与莫尔莱和达兰贝尔这样的外国名人联系。渐渐地，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这些挚友把他当成了一位老师。这些早期的弟子包括林德、威尔逊和罗米利。1780年，他完成了《道德与立法原则》，这本书虽然已刊印出来，但是并没出版。他的思索，还有朋友们的批评，都说明书中存在多处不足，因此，他决定先把此书留着，直到他完成修订工作后再正式发表。他曾把一部未发表的抄本送到鲍伍德那儿，那时谢尔本就在早餐时间把这本书拿给夫人和小姐们品读了，边沁怎么拦也拦不住；谢尔本还把这本书的校样拿给卡姆顿和阿什伯顿看，这两位人士似乎比那些女士们更能体会到这本书内容的深奥。

1785—1787年间，边沁在欧洲大陆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最小的弟弟叫塞缪尔，是一位杰出的海军建筑师，也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他已经为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工作了数年。由于弟弟身在俄国，所以边沁在游览了法国、意大利、地中海东岸和君士坦丁堡之后，又去了俄国。他在俄国住了近两年，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弟弟的工厂里，这个工厂位于克里科夫城附近。在这期间，他写完了《为高利贷辩护》，这是他所有短论中最著名的一篇。边沁认为俄国人少有使他感到有趣的地方，还认为这只是一个在富有哲学睿智的女皇颁布了法令后才开化的野蛮民族。不过，当他观察了这个国家后，这种想法也就渐渐地消散了。边沁身上没有像考生追求试题答案那样强烈的好奇心，因此他并没有去认真地钻研原始民族的习惯与

观念。长途旅行的劳顿使他内心疲倦，也使他远离了自己喜爱的一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后来是“悄悄地溜出了俄国的领土”。1787年12月，他来到了柏林，然后途经荷兰返回了祖国。长达数年的欧洲旅行并没有对边沁的思想产生影响，也几乎没有在他问世的著作中留下痕迹。他穷其一生，并非是当一个观察家，而是当一个分析家。

回到英国后不久，边沁结识了迪蒙。迪蒙对边沁名气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加有不小的功劳。迪蒙本是一位日内瓦公民，在政治纠纷的迫使下落魄成了流亡者。他是由罗米利介绍给边沁的。虽然迪蒙并不是一位见解独到或深刻的思想家，但他却能相当敏锐地感知新思想，并能娴熟地应用条理清晰、富有内涵的表达手法，这都是深受法国文学和语言熏陶下的人才具有的特质。单凭自身，迪蒙并无法赢得什么荣誉，但是，对于他所效力的两位伟人——边沁和米拉波——的声誉，他却可以当之无愧地与他们共享。1789年，边沁终于出版了《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为了这本书，他构思了整整15年。他在序言里说过，会在这篇导论之后再出版一系列作品，详细地探究法律的各个重要分支。后来边沁意识到，此生就算是长命百岁，也完成不了他全部的安排，但这部导论已经为他的权威和声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约在同期，法国国会召开了那场永载史册的三级会议。当时，法国人正热忱于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兴致勃勃地提出了不计其数的改革计划。于是，边沁开始有了新的期待，他觉得，自己所赞同的某些有关改良的观念，终究能够以宏伟的规模得到实现的。

在迪蒙的推荐下，边沁的作品引起了米波拉的关注。布里索特也亲自拜访了边沁，边沁则以前辈在晚辈面前的姿态接受了他的赞美。另外，边沁还赠送了几本自己作品的抄本给这位法国朋友，其中包括了《论政治策略》（也称《立法议会程序》）。在《道德与立法原则》的序言中，边沁就承诺过会写这本书，而这本书对法国而言似乎也大有用武之地，毕竟法国缺乏议会方面的经验，导致原本就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乱作一团。米拉波和多位有名望的批评家都褒扬这本书，但即使如此，这本书仍然没有得到成为议会指南的机会。后来，边沁向法国议会提交了建立模范监狱和济贫院的计划，并表示会无偿地在创办和管理的过程中提供援助。后来，虽然法国方面向他表达了感谢，并授予边沁成为法国公民的资格，但此事却从此戛然而止。那时的法国人太过高亢，改良监狱这种事得不到他们的重视。边沁也足够聪明，或者说是十分幸运吧，他并没有搬去法国定居——他对和平改革的期望在不久后就被彻底地击碎了，他那儒雅的本性实在不堪忍受法国令人痛恨的暴力统治。

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原则》之后不久，边沁萌生了加入议会的强烈意愿。他曾和兰斯多恩勋爵（也就是后来的谢尔伯恩勋爵）讨论过这个事情，那时他以为兰斯多恩勋爵已经承诺会提名他作为代表选入议会。后来，在发现对方并未采取任何举动来履行诺言时，他给兰斯多恩勋爵写了一封长达60页的抗议信，兰斯多恩勋爵则回了一封态度友善的信，信上解释说自己并非有心作此承诺，也丝毫不知边沁希望在议会中取得席位。

边沁接受了这个解释，并放弃了踏上政坛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考虑到从政可能会驱使他的独立人格屈服于权贵，也许是直觉告诉他——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确很强大，但若处于下议院，他就会变得毫无是处。

后来，他又有了一个计划——建立模范监狱。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这个计划而工作着。他称这种模范监狱为“圆形房”。这种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内部构造可以使坐在中央的人看到监狱的各个部位和所有犯人。圆形房的精妙设计来自于边沁的弟弟塞缪尔，边沁在监狱的结构和管理的细节上做了许多改进。他原本打算把这种圆形房只用来做监狱，后来又发现其实类似的设计也同样适用于作为百姓学习技艺的场所，或作为一些公共机构的办公地。在他已出版的作品里，有关解释和推崇圆形房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起初，他的计划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792年，议会还专门讨论过此事。1794年，关于按照边沁的设计图建造一座圆形监狱的议案获得了批准，被编进了法律中。当时，有关部门购置了一块宽广的土地用于落实此计划，一切都强烈地预示着这一方案会获得成功，然而计划却突然被终止，据说缘由是乔治三世坚决反对此计划。财政部为了弥补边沁对圆形房计划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便拨了很大一笔酬金给他，但这根本无法弥补他所遭受的失望。他本来对自己的计划在采用后所能带来的公共福利抱有很大的期许，但后来不得不放弃时，他再也不忍去看有关这一计划的资料了。他说：“这就像是打开关住魔鬼的抽屉，让魔鬼破门而入，把整个屋子都笼罩在阴森之中。”

边沁终身未婚。1792年他的父亲去世时，留给他相当丰厚的家产，让他可以专心地投身于改良法律的工作中。他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常常集中精力只去研究一个问题，并会备齐一切材料，资料多到够他写出一篇论文来；然后，就由他的批判精神来提出新质疑和新改进。写作的劳累让他把印刷作品的日子不断往后推延；他会把未完的手稿保留许多年，通常，他会在这段期间将稿子修改三四遍，但最终还是不拿去出版。如果边沁只是单靠自己的力量，那么这种工作方式必然会对他的影响力和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他发现迪蒙倒是可以成为弥补他这种缺点的助手。迪蒙总是愿意接过边沁粗糙的手稿，然后对论证中的大的遗漏点进行填补，并把冗长的分析删节，把复杂的思想精简，把手稿中生硬的字句剔除，将古怪的思想软化，同时为原文增添一些感情色彩。在这些加工之后，公众们就看到了一篇题材多样、逻辑清晰、辞藻华丽的文章了。在迪蒙的帮助下，边沁的创作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由于迪蒙是用法文来写的，所以，边沁的思想在国外的传播范围比在国内更为广泛，也受到了更多的褒扬。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对边沁的名字耳熟能详。他的朋友中有许多是俄国的官员，或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自由主义者，他甚至在南北美洲也有许多朋友和仰慕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邀请他帮助改进俄国法典。他也曾向巴伐利亚的国王表示愿意为改进巴伐利亚法典提出援助。后来，他还给希腊的起义者写了一封谴责君主制的信。他还为穆罕默德·阿里编写了宪法草案。至于这种互相礼待的行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成效，我们是很难去计量清楚的，然

而这一切都使边沁感到自己得到了理解，这支撑着他去坚持那些没有报酬的工作。

在祖国，边沁得到的鼓励很少。他逐渐感受到岁月增长给他的身体带来的影响，于是他渴望搬到气候更加温暖的地方去。他请求西班牙政府批准他定居到墨西哥，后来他想在委内瑞拉定居。这位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具有一种秉性，他总喜欢跑到那些即将发生混乱的地方去，幸好他的移民计划从未实现过。其实，在英国的日子也不是真的不快乐，他的身体状况也足以支撑他继续工作。虽然他很少社交，却总能交到新朋友。1805年，兰斯多恩勋爵的逝世使他失去了一位有影响力而又忠实的伯乐——正是兰斯多恩勋爵最先发掘了他，并且终生都未曾离弃过他。1808年，边沁结识了詹姆士·穆勒，这是一个几乎和迪蒙齐名的得力弟子。刚一认识，边沁和穆勒就很快成了密友，尽管他们的友谊之路并不平坦。边沁总是悄悄地帮助他，热情地对待他，但穆勒是一个贫穷而高傲的人，他自命不凡，不甘承受他人居高临下的帮助，这使得边沁难以忍受。边沁对穆勒的自负隐忍避让；他还认为，如果穆勒是位民主主义人士，其主要原因并非出自于他对大多数人的爱，而是出自于对少数人的恨。这两位友人发现他们的交往最好不要太频繁，有那么一两次，穆勒几乎打算彻底与边沁绝交，但问题从未发展到让他们真正争吵到断交的地步。

边沁的晚年除了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他自愿承担的工作以外，没什么其他值得记述的事迹了。他成为了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的企业的合伙人，这个企业打算协调工人的福利和